

# 一个华族社团的结构与功能演变<sup>\*</sup>

## ——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

任 娜 陈衍德

**摘要：**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一方面可通过其结构性变迁得以追溯，即决策权逐渐由个人向集体转移，以及人员不断扩展与网络渐次衍生；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其功能性演变得到展示，即从凸显宗教-政治性到注重文化-教育性，以及“非营利性”前提下经济收入来源与用途的转变。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历史。

**关键词：**新加坡福建会馆；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2)02-0047-11

一般认为，社团、学校和报纸是华族社会的三大支柱，其中，社团又是建构华族社会的基石。既然如此，通过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华族社团之解剖分析，来从个别到一般地考察华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实属必要。本文选择新加坡福建会馆为论述的对象，乃基于以下理由：新加坡虽为海外唯一的一个以华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但在其政治与民族政策指导下，其华族社会实与它国无异，这一政策是，华族“不能有民族优越感，不能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不能以中国为祖国”<sup>[1]</sup>，此其一；祖籍闽、粤的华人构成东南亚华人的主体，而闽籍华人在一些国家中又是最大的地缘群体，新加坡即属此种情形，此其二；福建会馆既是涵盖面最广的闽籍华人地缘性组织，又是最早出现的新加坡华族社团之一，此其三。

结构与功能的演变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正可追寻一个社会组织的历史轨迹。本文拟采用这一方法，来展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发展历程，并以此透视华族社会的演变。在结构性变迁方面，本文将围绕以下两点来阐述该会馆在组织上的变化，即决策权由个人向集体的转移，以及人员的扩展与网络的延伸；在功能性变迁方面，则将围绕以下两点来论述该会馆在职能上的演变，即从凸显宗教-政治性到注重文化-教育性，以及“非营利性”前提下经济收入的来源与用途的转变。

---

收稿日期：2002-02-19

作者简介：任 娜（1976-），女，河北保定市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陈衍德（1950-），男，福建厦门市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sup>\*</sup>本文资料的搜集得到了新加坡福建会馆理事陈建存先生的协助，特致谢忱。

新加坡福建会馆的萌芽，乃是恒山亭。作为具有帮派组织性质的漳泉人公冢，它至迟在 1828 年即已存在。<sup>[2]</sup> 1839 年，闽帮在陈笃生、薛佛记等人领导下，于直落亚逸街兴建天福宫，1842 年建成后闽帮议事会所附设于此，天福宫也就成为福建会馆的前身。1916 年，“天福宫福建会馆”获华民政务司署批准为豁免注册的社团。在此之前，已有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等先后出任会馆领袖，在此之后，又有薛中华、陈嘉庚、陈六使和黄祖耀等相继出任总理或主席。新加坡福建会馆 100 多年的历史轨迹，将由下文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变迁之探讨中展示出来。

## 一、结构性变迁之一：决策权由个人向集体的转移

早期华族社团的领袖必须具备下列三要素：一是乡族背景，因为“闽粤两地单姓村特多，不少同乡会实际上为宗族世系群”；<sup>[3]</sup> 二是财力基础，因为华族社会缺乏士绅阶级，只有财力雄厚的商人才能垄断这一社会的领导权；三是沟通华夷，并代表殖民当局管治华族社会。概言之，他们必须是民间统治精英（non-stateruling elite）式的人物，亦即身在民间却能行使统治职能的人。上述要素决定了早期华族社团的领袖是权威型、魅力型的，从而社团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这类人物高居于顶端的金字塔式的结构。

1916 年以前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可称为“陈氏家族时代”，其间陈氏祖孙三代相继出任会馆领袖，他们是陈笃生（1840-1851）、陈金钟（1860-1892）和陈武烈（1897-1916）。三者间隔期虽有他人为领袖，如陈金声、蔡锦溪等人，但在位时间均不长，作用及声望亦不如其显著。所以，这一时期的会馆具有家族统治和强人主宰的明显特征。作为第一任天福宫炉主的陈笃生自不必说。其子陈金钟“受华、英文教育，通晓许多语言，既通文墨又能言善道，是翘翘者流”，在生意上也极为成功，是有名的米业巨头；<sup>[4]</sup> 其孙陈武烈既是“叻埠知名商家”，又是政界知名人士，都兼有家世、财力和才干的优势。陈金钟虽有蔡锦溪、邱正忠协掌会务，但其地位为三人之首，且从未受到挑战，则是无疑的。这从他死后才由蔡、邱二人出掌会馆，也能得到证明。此间“天福宫并无立章选举之条规，且天福宫并无领袖纷争之事迹”，反映了会馆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个人威望的基础之上。而会馆领袖的权力，“远较 1890 年社团法令之通过（后）……的华族领袖要来得大”，也反映了其个人专断的掌权模式。1897 年的首次选举，并不意味着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动。陈武烈虽经选举上台，但其家世背景当为不可忽略之因素。领导层的扩大（由正副董事 3 人及协理 21 人组成），也不意味着决策权已转归集体。因为组织散漫依旧，既无章程且无定期选举。“少数闽邦资本家所长期控制”的会馆，仍然体现为以“陈氏经济与社会力量”为基础的个人专断。<sup>[5]</sup>

1916 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立章，选举薛中华为总理、陈精仙为协理，意味着陈氏家族统治的结束。但薛氏的专断一如前任，同时作为中华总商会会长的他，仍属权威型人物。此间虽订立有新会章，但“组织并不严密且有欠民主”，“绝大部分闽人不但非为会员，且没有投票与议事之权利”，“每议事，似未有会议记录，盖每议一事，一经会董画诺，仅凭一口宣传”。<sup>[6]</sup> 所以此间的会馆，“实际上只是薛中华等少数人所控制的组织”，<sup>[7]</sup> 决策

权操于个人而非集体的状况并未改变。

在 1927 - 1929 年间福建会馆改组的基础上，陈嘉庚于 1929 年出任会馆主席，从此开始了决策权由个人向集体转移的过渡期。会员资格的认定（详下文）与组织机构的确立，为此次改组的两大内容。此前具有个人专断色彩的董事制被改为较具民主色彩的委员制，且分为执行、监察两委员会，执委会下又设总务、财政、教育、建设和慈善五科，各科职员均由当选的委员出任。但是，陈嘉庚的个人局限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放弃个人决策的模式。作为企业家的陈嘉庚，其管理方式反映了其思想深层中的决策理念。“他事无大小皆亲身视事……各个集团的行政采取高度中央集权制一切决策几乎全由陈嘉庚一个人决定……实行家长制的企业管理法”。<sup>[8]</sup>这一决策理念必然影响到他对福建会馆会务的处理。有论者这样评价陈嘉庚在会馆中的地位：“陈嘉庚控制福建会馆，始于 1929 年……他一直包揽了主席的职位，长达二十年之久……战后初年的执委，多半是陈嘉庚的支持者。”<sup>[9]</sup>可见，对会务的专断是其对企业的专断之自然延伸。再者，陈嘉庚也无法超越帮权政治的时代局限。他虽有攻击帮派观念的超时代举止言论，但“毕竟还得巩固闽帮帮权与组织，从而逐渐领导超帮的社会与政治活动”。<sup>[10]</sup>帮权政治的特征之一是，领袖权威在帮派内的确立进而扩展至帮派之外，而决策上的个人专断乃是此种权威人物的必然之举。所以，陈嘉庚只是使个人专断的决策模式从显性变为隐性，而未变更其实质。但是，福建会馆的决策权自个人向集体的转移，毕竟也开其端倪了。

继陈嘉庚之后出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虽然任职时间相当长（1949-1972），但他长期追随陈嘉庚，为同一类型的人物，所以在决策模式以至组织结构上，均无太大变化。但因陈六使的声望已较陈嘉庚逊色，而民主化的趋势也在动摇着个人专断的社会基础，所以此间决策权由个人向集体的转移已日益接近过渡阶段的尾声。

真正实现决策模式转变的是自 1972 年至今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黄祖耀。在他领导下，1983 年会馆的组织形式由执、监委员会制改为理事会制。经过数度修改，1995 年颁布的《新加坡福建会馆章程》规定：“会员大会为本会最高权力机构”（第 17 条）；会员大会的职权为“接纳与通过理事会的报告与批准建议”（第 18 条）；常年会员大会和特别会员大会“所讨论的提案以多数票取决”（第 31 条）。<sup>[11]</sup>领袖人物既不再处于居高临下之态势，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亦不复存在；依据个人意志的领袖决策（虽然自陈嘉庚始其理性成分已居主导地位），也被制度化的集体决策所取代。经过漫长的过渡，决策的民主化终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得到确立，从而完成了一项重大的结构性变迁。考察这一变迁，可以发现它是在两个相关因素的互动中实现的。那就是，权威型领袖人物与帮权政治凸显时代的互动产生了个人专断模式，民主型领袖人物与方言群意识淡化时代的互动则产生了集体决策模式。

## 二、结构性变迁之二：人员的扩展与网络的延伸

成员的多寡及参与程度如何，是华族社团发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华族社团的作用在早期主要体现为领袖人物的作为，后来则主要体现为广大成员的积极参与。新加坡福

建会馆也是遵循着这一历史轨迹发展起来的。早期东南亚的福建人并非福建省人之意，而是指操闽南话的祖籍福建南部的人士，尤其是祖籍漳、泉二州的人士。所以恒山亭“只是泉漳人士之义山”；天福宫则是“泉漳最早南来之移民所设立之神庙”。<sup>[12]</sup> 由于闽南人构成福建帮的绝大部分，故其同乡会冠以“福建”之名便不足为奇。然而，直到薛中华为总理时，仍“未有会员注册与登记”，绝大多数闽人仍非为会员，“每届选举最多仅限三五家商号或闽侨闻人而已”。<sup>[13]</sup> 由于客观上存在着选举资格的限制（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以便履行职责），“这些要求实际上排斥了社会经济处于低层次的会员”，<sup>[14]</sup> 所以早期福建会馆的群众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它实际上只是少数富裕闽商的组织。

1927-1929年间的改组是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步骤。“福建会馆始于1927年11月底登报征集会员，凡闽侨优秀分子，有正常职业而原认捐基金者，即可为永远会员，且可被选为会董”。<sup>[15]</sup> 会员资格的认定为广大闽侨的入会敞开了大门，而会员注册、登记手续的实施，则是健全组织的基本保证。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加坡的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为最大的方言群，在华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先后为40.1%（1921年）和39.2%（1931年）。<sup>[16]</sup> 又按战后非闽南人在福建人中所占比例不超过10%来看<sup>[17]</sup>，战前新加坡闽南人应占福建人90%以上，福建会馆的根基应十分雄厚。可惜缺乏当年的会员登记资料，无从作出精通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亦即陈嘉庚必须依靠漳、泉二州富商的人、财、物力，加上地域观念的限制，故当时会员基本上仍局限于以泉漳为主的闽南人当中。直到陈六使任主席时，才“广邀福州帮、兴化帮与福建客帮参加会馆，使福建会馆不限于漳泉人士而成为所有福建人之会馆，名实相符，表里一致”。<sup>[18]</sup> 这也是帮派观念淡化和国家认同转向（不再是中国人而是新加坡人）的必然结果。

自陈嘉庚时代始，会员开始广泛参与会务，使会馆蓬勃而有生气，这又反证了人员扩展所带来的组织基础扩大这一重大变化的实在性。到了黄祖耀时代，福建会馆已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地缘性组织，其章程规定：“凡是新加坡福建籍人士年龄达二十一岁及有正当职业者，都可加入本会为会员。”（第4条）为了鼓励会员多作贡献，章程又规定“任何会员缴付1000元的永久会员费后，将被接纳为永久会员”。（第5条）<sup>[19]</sup>。与此同时，会务的公开化也是前所未有的，如在每期的会讯《传灯》上，都有各种会务活动的报道，并且不定期地公布新会员的名单。

考察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可以发现有一个以该会馆为中心的网络，先是覆盖了闽帮内的各地缘群体，进而扩展至整个新加坡华族社会。这一网络的形成，早期乃表现于闽帮内各地缘群体的分化与整合当中。例如，清代永春升格为州，与漳、泉二州平级，但永春人却无法进入闽帮的领导核心，故有游离于闽帮总机构之外的金兰庙和永春会馆等组织之出现。然而“当这些分化出去的小集团面对外帮时，立刻意识到力量的单薄，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母体而生存”，因而仍与总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又整合进闽帮大集团，永春人陈金声以“外围进逼”方式挤进闽帮领导核心，即可为证。<sup>[20]</sup> 此种网络化方式，可称为“内衍式”。

这一网络的形成，后来则表现于与其他华族社团的“执事关联”当中。“所谓‘执事关联’（interlocking officership），就是指一对或数个社团聘用同一人士为董事、理事或重要职员的现象；一对社团如执事关联数愈多，则关系愈为密切，许多社团如有了执事关联，

也就可借此作为交往的‘频道’”。<sup>[21]</sup>以下列表展示新加坡福建会馆近两届（1998-2000、2000-2002）理事的“执事关联”情况：

表1 新加坡福建会馆理事“执事关联”人数统计

兼职职位数	1	2	3	4	5	6
34届兼职人数	8	13	6	7	7	1
35届兼职人数	10	10	12	7	5	1

资料来源：新加坡福建会馆第34/35届理事会名册。

表2 新加坡福建会馆理事“执事关联”百分比（%）统计

兼职职位数	1	2	3	4	5	6
34届兼职百分比	17	28	13	15	15	2
35届兼职百分比	21	21	25	15	10	2

资料来源：同表1。

在34届理事会的47位理事当中，兼任其他社团理事的有42人，约占89%；在35届理事会的48位理事当中，兼任其他社团理事的有45人，约占94%。其中兼任4个以上（含4个）其他社团理事的百分比分别是32%和27%。在既无从属关系又无权威系统的各华族社团当中，完全是通过各社团领袖人物互相重叠而构成的网络来取得联系的。其中，一些社团的理事兼职的比例特别高，所兼职务也特别重要，从而成为联系的中心，可称为中心社团。新加坡福建会馆即属此类社团。这一点，除上列二表数据可作证明外，会馆主席黄祖耀同时又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亦可为证。这样，以该会馆为中心的网络覆盖了整个新加坡华族社会，便是一个不可否认之事实。此种网络化方式，可称为“外延式”。

### 三、功能性变迁之一：从凸显宗教-政治性 到注重文化-教育性

时代变迁促使社团功能发生变化，功能的变化是“适者生存”法则的必然反映，所有社团概莫能外。“帮的存在把华人社会划分为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每一个帮都形成了自己的世界，有它们自己特征的寺庙、墓冢和学校”。<sup>[22]</sup>这些机构虽然一直延续下来，但在各个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至少其侧重点不尽相同，从而显示了一个社团在不同时期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使命。

故土文化的延伸及在新的土地上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使宗教信仰成为早期华人移民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恒山亭和天福宫便是新加坡福建帮这种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共同的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使来自闽南的华人聚集到一起。祖先崇拜唤起“根”的意识，神明崇拜则超越了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为本帮群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宗教信条。二者都产

生了巨大的凝聚力，闽帮领袖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发挥其政治上的作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祭拜航海女神妈祖的天福宫原为所有华人而建，但“由于该宫多数的创建人是已经控制（天福宫）理事会领导权的闽南人”，“他们（闽南人）还常把它作为会议和聚会的场所”，“最终导致其它方言组织不再参与该宫的活动”。<sup>[23]</sup>然而，由于闽帮的实力最强，又由于共同的妈祖崇拜，所以天福宫作为华族社会宗教活动中心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这也是闽帮领袖成为事实上的华族社会领袖的重要基础。“1873年立法会议员里德（W.H.Read）指出，当时在新加坡至少有三位华侨商人起着甲必丹的作用，他们是陈笃生、陈金声和陈金钟”。而此三人均曾为福建会馆领袖，他们在作为闽帮帮主的同时，还作为殖民当局的代言人，“倾全力使本帮华侨服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为稳定殖民统治秩序效劳”，<sup>[24]</sup>从而使会馆具备了人格化的政治性能。由此可见，宗教、政治性能的相互关联，是福建会馆早期历史的重要特征。

那么，会馆的宗教-政治性是如何体现出其实效的呢？由宗教性派生出福利职能；由政治性派生出公证与仲裁职能，可说明这种性能-实效过程。早在恒山亭时代，“亭内订立规则，泉漳船只，要遵照规定捐化，否则其船中头目、伙计如有身故者，不许附葬于公冢”。<sup>[25]</sup>天福宫和后来的会馆大约也继承了这种做法，并且捐赠给寺庙的款项也可能部分地用于身故者，从而使闽帮成员的丧葬费用得以解决。在人生终结时得到妥善安置，历来为华族文化所注重，而此种物质上的福利即源于宗教性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早在天福宫时代，陈笃生便“在任内开创了会馆证婚的先河”，<sup>[26]</sup>后者亦继承之。再者，对于福建会馆这样的中心社团而言，仲裁职能尤为重要，“它的影响力越出会馆范围，对整个华人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影响”，<sup>[27]</sup>如薛中华任内“成功地调停了福清、兴化二籍车夫打斗事件”。<sup>[28]</sup>早期会馆的自治性能及其实效，可说是中国本土基层社会的自治性与殖民当局授予部分管治权力二者结合的产物。

然而，像福建会馆这样的华族社团的政治功能，毕竟要取决于殖民者的统治形式。1826年新加坡并入海峡殖民地后，甲必丹制度虽已废除，但英国人仍依靠华族领袖实行间接统治。直到1877年标志着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华民卫护司署的成立，华族领袖的政治-社会角色才有了变化，福建会馆的政治功能因而有所削弱。另一方面，19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成为华族社会最高领导机构，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它采取分帮选举制度，各帮侨领通过进入其最高领导层来发挥政治上的作用，如福建会馆总理薛中华即曾任其会长。这样，在管治华族社会方面，福建会馆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和间接化了。

进入陈嘉庚时代，福建会馆“逐渐脱离帮的局限性与狭隘性，开始搞社会国家问题有关的运动”。<sup>[29]</sup>如1930年代福建会馆与星马闽侨会馆等发动的旨在革除闽南侨乡弊政、振兴社会经济的“救乡运动”；该会馆促请中华总商会召集全侨大会并致电美国与国联反对日本占我领土的义举；该会馆发起的赈济故乡灾民运动，等等。这说明此间福建会馆的政治关怀有了新的侧重点，而它在本地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则相对减弱。与此同时，因宗教、政治性能不再相互关联，复因改良劣俗和丧仪，会馆宗教职能的重要性也不如从前了。

陈六使出任主席的早期，福建会馆政治功能的指向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至其后期，会馆的政治性功能则趋于消失，最终完全被文化-教育性功能所取代。战后初期的10余年间，正好是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期，陈嘉庚那种中国本位的政治思想已无法由陈

六使来加以实践，后者逐渐疏离中国政治，转而关心居留地的政治发展。以陈六使为主席的中华总商会发起争取华人公民权的运动，号召华人运用选举权选出代表自己的议员。团结所有华人而不仅是一帮一派去争取正当权益，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这使得福建会馆的政治角色愈益淡出。在新加坡从自治到独立的过程中，“李光耀率领下的接受英式教育的华人领导集团害怕支持中国和华人权力的当地华商阶层”，<sup>[30]</sup>最终使包括福建会馆在内的所有华族社团的政治功能都趋于消失。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不再从传统帮派社团首领中挑选高层管理人才，政府高层官员也大都大都不加入传统宗乡会馆的活动”，<sup>[31]</sup>使社团成为有别于政党的非政治性组织。至此，福建会馆成为纯粹从事民间活动的组织机构。与此同时，会馆的宗教职能也仅限于管理所辖庙产，与历史上曾具有的重要性无法比拟了。

在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对国人使用何种统一的语言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促使福建会馆对文化-教育倍加关注，并导致会馆的功能逐渐向兴办华文教育和振兴中华文化倾斜。在李光耀看来，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言，并能使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因此政府大力提倡英文教育。但是许多华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李光耀的态度是“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因而压制了这场争论。而许多华人为了现实的利益，也只好让子女就读英文学校。<sup>[32]</sup>华文教育的式微，是与福建会馆长期努力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福建会馆重教兴学的历史源远流长。陈武烈任内即兴办道南、爱同和崇福女校3所学校。陈嘉庚改组会馆时，使许多闽帮所办学校得到会馆的经费补助，又创办南侨师范（战后改为南侨女中并附设小学）。陈六使上任不久又有光华学校之创立。以上便是隶属于福建会馆的五所华校。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在会馆理监事联席会议上倡议筹办南洋大学得到热烈支持。陈六使为此认捐500万元，福建会馆也捐出云南园土地500英亩为建校之地。“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sup>[33]</sup>1956年3月15日南大开学，成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陈六使此举显然是受陈嘉庚创办厦大的影响，但“南大的创建，在陈六使眼中，完完全全是为马新文教发展而设，与厦大着眼培养中国人才旨趣大别”。<sup>[34]</sup>后来在政府倡导英文教育的过程中，“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加上李光耀认为接受华文教育的南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有困难，最终将其与新大合并而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sup>[35]</sup>

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之争，既是现代与传统之争，又是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加坡国家领导人与华族社会领袖之争。前者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后者则侧重于保持华族的文化特征，应该说都无可厚非。后来李光耀也承认，英文教育“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sup>[36]</sup>因而发起学习华语运动。这就证明以福建会馆的领袖们为代表的观点有其前瞻性与合理性。以此为契机，福建会馆进入了一个以振兴文化-教育为特征的新时代。会馆所建立的“福建基金”于1977年获准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该基金除了用于慈善、福利事业之外，还是会馆属下五校学生奖、助学金的主要来源，其金额已从最初的300万元增加到1999年的2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奖学金的颁发已超越了族群的界线，如2000年有2名马来族学生获颁大专奖学金。会馆还大力倡导以文艺活动的形式来弘扬传统的精神文明，使所属学校在作为教学机构的同时，又成为文艺活动的基

地。1991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奖学金”正式设立，以“资助具有文化潜能及肯献身文化艺术的人士修读华族文化艺术课程，以培养文化、艺术人才”。<sup>[38]</sup>此外，会馆辖下各庙宇的活动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活动，而是具有了日益浓厚的文化色彩。学校和庙宇作用的多元化，显示了会馆历史使命的新变化。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并受到华族社会的广泛而热烈的支持，标志着福建会馆立足于华族社会的基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亦即从以宗教-政治性为依归转变为以文化-教育性为诉求。与此相适应，福建会馆的功能也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兴办华文教育和振兴传统文化的运动虽因国内外的形势而一度受挫，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终于在黄祖耀时期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光明前景。

## 四、功能性变迁之二：“非营利性”前提下

### 经济收入的来源与用途的转变

华族社团“是不以牟利为主要组建目标的民间志愿团体”，<sup>[39]</sup>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功能是非营利性的。然而，社团的运转和活动的展开又需要经费。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一是会员的会费和捐助；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有限的经营性收入。由于时代的变迁，新加坡福建会馆的经济收入来源与用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正可从另一侧面考察其功能性变迁。这里之所以将来源与用途联系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二者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早期福建会馆的经济来源之一是天福宫的香火收入，但“天福宫每年入息与开支每每尚欠清楚，据陈嘉庚等人估计，天福宫每月入息约2000余元，每年最少则在万元以上”。<sup>[40]</sup>此数目显然不敷天福宫本身的开销，因为陈武烈时仅“裁制三年一举之迎神会……每次估计可省糜费四五万元之谱”。<sup>[41]</sup>所以会馆更为重要的收入应是财力雄厚的商人之捐助，这与前文提到的会馆的领导权为此类人所垄断，在逻辑上是吻合的。从福利开支的庞大，也可推断富商捐助之巨。那个时代的新马华族主要会馆，大都“可满足会员最主要的福利需要，包括免费接纳会员、寻找工作以及提供卫生保健和办理免费丧葬事宜”等。<sup>[42]</sup>福建会馆当然不会例外。至于当时会馆所辖教育机构，也无一例外均为富商出资维持。

1927-1928年间的改组使福建会馆确立了健全的财务制度，此后会馆每年收支均有数目可查。如1930年会馆累计收入达8万余元，其中3万余元为改选以前的旧董事所移交，其余“则出自会员与闽侨月捐等等”；同年开支，“津贴与接管闽侨各校共费去5万余元”，其余则用作他费。1930年代新马华族会馆的特点之一是既关心桑梓又关心祖国兴亡，其中福建会馆起领先作用，经常筹款赈济故乡灾民和支援祖国抗战。此类款项显然无法由日常收入拨充，必需以临时性募捐来加以解决。如1935年8月，福建会馆“筹赈闽南水灾共得叻币3.2万余元，全共5.2万余元国币”。<sup>[43]</sup>可见陈嘉庚时期福建会馆的经济收入大致可分为日常性和临时性两部分，前者主要用于会内开支，后者主要用于会外开支。由于会馆群众基础的扩大，参与捐助的会员已大为增加。庙宇香火收入的比例则进一步下降。此



外，1937 年福建会馆注册为非盈利有限公司，<sup>[44]</sup> 可说是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其功能的非营利性性质。

陈六使时代福建会馆经济收入来源的最大变化，是从以会员捐纳为主转变为以馆业收入为主。此间会馆购置的主要产业有：“1952 年以 42 万多元购下云南园 900 余（英）亩土地；1964 年以 26 万多元购下万礼园 391 英亩土地；1964 年再以 52 万多元购下三巴旺 131 英亩土地”。<sup>[45]</sup>此外，1954-1955 年间还以 40 万元在天福宫对面戏台地段兴建福建会馆大厦。购置馆业的资金除了长年积累之外，会馆领袖的垫付或捐献也构成其中的重要部分。如购云南园的资金即由陈六使垫付，一年后由会馆返还；建会馆大厦的资金则由陈六使与李光前各捐一半组成。这些产业的收入成为会馆所属教育和慈善事业经费的主要来源，有的楼宇还成为办学的场所，如福建会馆大厦同时还是爱同、崇福二校的校址。这样，会馆的主要经济来源便由直接取自会员过渡到取自所属产业的收入。从资金用途的角度来看，也从陈嘉庚时代的政治性用途突出，转变为陈六使时代的教育性用途居于主导地位。

陈六使时代还提出了建屋出售的思路，以拓展收入来源。1969 年 8 月，会馆常年大会通过了云南园建屋发展计划，拟于 400 多亩土地上建 173 个单位住屋，费用估计为 500 余万元。<sup>[46]</sup> 尽管该计划的实施延迟多年，但它的提出却具有深远意义。当以政治热情为动力的会员捐助不再成为会馆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开拓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收入渠道势在必行。而这种渠道必然与营利性事业相联系。按照国际惯例，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既可拥有财产，亦可在一定范围内经营有限的营利性事业，以弥补本社公益活动的开支。<sup>[47]</sup> 因此这一计划既符合市场要求，又不违背总体上的“非营利性”原则，同时它又可使会馆获得充足的经济收入。

黄祖耀时期会馆的有限的营利性事业获得长足发展。1987 年会馆获得云南园开发准证，次年会馆独资附属公司“云南园实业私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建屋计划得以全面实施。经修订后的计划分为七期，拟建 306 个单位的排屋、独立式与半独立式的洋楼。至 1993 年一、二期共 82 个单位已全部售罄。<sup>[48]</sup> 此后会馆又成立了“倍利实业私营有限公司”，开发马里士他路地段的房地产业。<sup>[49]</sup> 逐步增多的营利性事业是否会影响会馆的非营利性？这关键要看营利性收入如何使用。会馆章程规定：“本会馆不得将入息、财产或其中一部分当作以分利、花红或盈余方式，直接或间接的给予本会会员……但本会得以给予对本会确有服务的职员、工友、会员或其他人士酬劳……”（备忘录第 4 条）。<sup>[50]</sup> 这就保证了除必要的酬劳之外将所有经济收入用于公益事业，从而确保了会馆的非营利性性质。

\* \* \*

饱经沧桑的新加坡福建会馆历时一个半世纪以上，它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身的结构与功能，至今仍活跃于新加坡华族社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说明它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华族社团。从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这一点新加坡华族与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族并无区别，所以它仍然会遇到文化适应问题。华族社团的发展与演变，其基本点也是文化。“陈六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警告道：‘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文化……40 或 50 年内，我们也许就不能再称自己为华人了。’”<sup>[51]</sup> 因此，包括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内的

所有华族社团,其外在形式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种种不同,其内在本质却始终文化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族社团始终围绕着文化调适这一轴心运转,因为“文化死亡的威胁比个人死亡产生更深刻的恐惧”,<sup>[52]</sup>而只有在变异中求得存续,才能避免文化的死亡。不仅如此,由于“会馆的历史通常孕育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之中”,<sup>[53]</sup>它还必须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以便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求得生存,从而将文化延续下去。至此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历史。

#### 参考文献：

- [1] 陈岳等. 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M].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25.
- [2] 曾玲. 坟山组织、社群共组与帮派整合——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J]. 新加坡：亚洲文化，2001，（24）：124.
- [3] 施振民. 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演变[A]. 华人移民[C]. 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92.190.
- [4] 邱新民. 新加坡先驱人物[M]. 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1983，（2），13.
- [5] 杨进发. 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10-119.
- [6]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0-129.
- [7] 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Z]. 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L-23.
- [8] 林孝胜. 新加坡华商与华社[M].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159.
- [9] 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139.
- [10]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8.
- [11]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HokienHuay Kuan [Z], Singapore, 1995, p.10; p.14.
- [12] 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Z]. 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L-22.
- [13]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1.
- [14] [澳]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51.
- [15]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4.
- [16] [英] W. G. 赫夫著，牛磊等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 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55.
- [17] 福建省志·华侨志[Z].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64.
- [18] 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Z]. 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L-27.
- [19]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HokienHuay Kuan [Z], Singapore, 1995, pp.6-7.
- [20] 林孝胜. 新加坡华商与华社[M].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30-43.
- [21] 李亦园. 一个移殖的市镇 -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M].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133.
- [22] [澳]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166.
- [23] [澳]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39.
- [24] 林远辉，张应龙.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210；212.
- [25] 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Z]. 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L-22.
- [26] 新加坡福建会馆简介[Z]. 新加坡：福建会馆，1995.2.
- [27] 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Z]. 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L-45.
- [28]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2.
- [29]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7.
- [30] [英] W. G. 赫夫著，牛磊等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 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48.
- [31] 李明欢.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153.
- [32] 李光耀. 经济腾飞路 - 李光耀回忆录[Z].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42-143.
- [33] 李光耀. 经济腾飞路 - 李光耀回忆录[Z].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45.
- [34] 廖文辉. 发展文教事业最杰出贡献：陈六使创建南大[N]. 吉隆坡：南洋商报，1999-2-7，（D6）.

- [35] 李光耀.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Z].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43、147.
- [36] 李光耀.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Z].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43.
- [37] 福建会馆 2000 年常年奖学金颁发仪式[Z]. 新加坡：传灯（新加坡福建会馆会讯）[Z]，(21)，6-7.
- [38] 新加坡福建会馆简介[Z]. 新加坡：福建会馆，1995.3.
- [39] 李明欢.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290.
- [40]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3.
- [41] 杨进发. 早年天福宫的领导层[A]. 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17.
- [42] [澳]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44.
- [43] 杨进发. 战前新加坡的福建会馆[A]，陈嘉庚研究文集[C].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125-127.
- [44] 新加坡福建会馆简介[Z]. 新加坡：福建会馆，1995.3.
- [45] 福建会馆简史[Z]. 新加坡：传灯（新加坡福建会馆会讯）[Z]，(1)，2.
- [46] 福建会馆简史[Z]. 新加坡：传灯（新加坡福建会馆会讯）[Z]，(1)，3.
- [47] 李明欢.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297.
- [48] 新加坡福建会馆简介[Z]. 新加坡：福建会馆，1995.4.
- [49] 确保会馆与时并进攀更高峰[Z]. 新加坡：传灯（新加坡福建会馆会讯）[Z]，(20)，1.
- [50]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HokienHuay Kuan [Z], Singapore, 1995, pp.5-6.
- [51] [英] W. G. 赫夫著，牛磊等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 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49.
- [52] 施振民. 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组织在海外的演变[A]. 华人移民[C]. 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92.243.
- [53] Wing Chung Ng, Urban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Some Unexplored Aspects in Huiguan Development in Singapor, 1900-1941 [J], Cambridge: Modern Asian Studies, V.26, No.3, 1992, p.492.

[ 责任编辑：廖大珂 ]

develop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Key words:** financial interven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iland; Malaysia

## **Insight into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Singapore**

Wang Q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harp fluctuations in Singaporean economy. It 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impacts of the economic 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s of domestic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nd restructuring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face of the rapid recession of domestic economy, Singaporean government has made active moves to energetically carry out domestic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adjustment. In the long and medium term,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will slow down and fluctuation will intensify.

**Key words:** Singapore; economic fluctuati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thnic Chinese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i Yipi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ethnic Chinese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and provides a profi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hinese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redicts the prospects of ethnic Chinese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 ethnic Chinese society ; changes ; development

## **Overseas Restructuring of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Prospects**

Wang Ningnan

**Abstrac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Southeast Asia, the overseas enterprises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men in Southeast Asia were badly attacked. Therefore, the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have carried out a range of strategic recapit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With the recove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the overseas enterprise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have also gradually extricated themselves from business predicament, and the recapit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have won initial success.

**Key words:** ethnic Chinese businessman; overseas enterprise; recapit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 **History of Singapore Hokien Huay Kuan: Evolution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Ren Na Chen Yande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Hokien Huay Kuan can be traced,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its structural changes, namely, the power of decision-making being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a few leaders to the collective, meanwhile the members increasing and the network expanding; and on the other, through its functional evolution, that is, from stressing politics and religion to focusing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the sources and uses of its income changing on the premise of ' non-profit making '.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Hokien Huay Kuan is a history of adapting itself to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Singapore Hokien Huay Kuan; Structure; Function